

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

重点学科“民俗学”建设项目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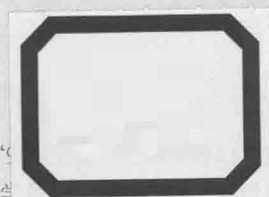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

主编 林继富

当代北京评书书场研究

杨旭东◆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市重点学

资助

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

主编 林继富

当代北京评书书场研究

杨旭东◆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北京评书书场研究/杨旭东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1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 / 林继富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2480 - 0
I. 当… II. ①杨… III. ①北方评书—表演艺术—
研究—北京市 IV. ①J826.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3707 号

当代北京评书书场研究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李燕妮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市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1
定 价: 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480 - 0/J · 656 (汉 32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杨旭东 男，1981 年出生，汉族，河南新野县人。2011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法学（民俗学）博士。现就职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主要从事民俗学方面的研究。

总 序

中国现代民俗学建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成为学人关注的对象。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战乱，大批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道路，进入我国的西南彝族、白族、苗族等地区调查，在此过程中搜集和采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俗。比如，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吴泽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与陈国均合编）、《贵州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等。这些著作中记录的民俗是众多知识分子为了了解西南民族生活，在明确学科意识基础上调查采集的成果。通过他们的努力留下 20 世纪 40 年代西南少数民族宝贵的民俗传统，留下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与国家文化保护和文化发展紧密相联，并且在众多学人脚踏实地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民族识别带来少数民族民俗的全面搜集、记录和整理。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主要时间集中在1950—1964年，到1983年加上原来已经公认的民族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分。这个时段的少数民族民俗搜集、记录是为民族身份识别、确认服务，存在价值判断的选择性和政治需要的方向性，它很少考虑现代学术的体系性和内在结构的规律性，它更多的将民俗作为佐证身份的材料和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为了强化少数民族身份，在民族民俗采录和发掘的过程中，一些带有标志性的民俗被反复运用、改编和宣传，这些民俗几乎成了该民族的文化符号了，诸如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藏族的格萨尔等。这些民俗传统成为今天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也开启了民族文化品牌建设的序幕，尽管是不自觉的文化行动。

从1979年开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集成》等十大文艺集成的工作，十部集成均按现行行政区划立卷，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台湾省）各一卷，这其中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民俗传统。“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目的在于全面搜集和记录流传在广大乡村的民间文化。这个活动同样是政府主导的文化行动，围绕民间文化搜集和记录展开，目的是较完整和系统地保留中国民俗

文化，因此，全面性、科学性和代表性成为这次保护民俗传统活动的明显特点。

进入 21 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自此，以民俗学为代表的学人开始大量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并且结合中国学术经验而不断消化，使之逐步本土化，以此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中，主要内容是针对收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传承人等开展的调查、申报、评审、确认、保护与研究活动，少数民族民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引起了世界的重视，截至 2009 年，中国已有 29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侗族大歌、格萨（斯）尔、热贡艺术、藏戏、玛纳斯、花儿、朝鲜族农乐舞、蒙古族呼麦等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现代民俗学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因此，清理和研究记录下来的文字化的民俗传统成为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加速了民俗传统的变异与消亡，这种令人堪忧的状况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的民俗来说尤为突出。因此，加强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传统的发掘、搜集、记录和整理成为当今中国学人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的重要基地。学校

在建立之初,就有大批学者致力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立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的历史资料。在民族学、社会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支撑下,积极探索了新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20世纪80年代,杨成志、马学良等专家直接参与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重建;学校汇聚了大批熟悉民族历史文化、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民俗学研究专家,为本学科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央民族大学向来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中央民族大学的许多教授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界精英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立的坚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学良、陶立幡、李耀宗等学者成为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歌谣集成等卷本方案的设计者、执行者和领导者。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专家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如陶立幡、祁庆富、邢莉、林继富等均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家,积极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之中。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央民族大学对少数民族民俗传统和少数民族民俗生活的高度重视,也成为民俗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前进的方向。2011年开始,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在国家“985工程”支持下,积极投身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运动中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因成绩突出,2012年获得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的称号。

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下，在“211工程”、“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在方向凝练、学术创新、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实力进一步提升。2000年建立民俗学硕士点，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形成了三个特色鲜明的学科方向：一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方向通过对各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变迁的研究，在构建一国多民族民俗学理论体系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着力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建议；二是少数民族口承文化研究，本方向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口承文学史、民族民间叙事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三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与文化创意研究，本方向重视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认知、价值转换模式、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多年来，本学科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统一的研究范式，致力于推进多元一体的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建设，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提供了智力支持。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着力研究中国55个少数民族民俗，在借鉴已有国内外民俗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理论体系，开拓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志调查与写作研究、中国民间叙事及其传承人考察、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时间调查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与民族认同研究。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师生正在以脚踏实地的田野精神，以开拓独特的学术路径，为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服务。

为了让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师生以及与之相关学界同仁在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成果时，能够更好地、更快地惠及国家文化建设、惠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惠及更多的学界朋友，推进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我们组织了“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书系”。书系侧重于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师生调查研究成果，偏重于选择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著作。在行为上以田野调查的现在性记录和实证性研究，提出少数民族民俗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命题；在观念上表达学人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见识和理解；在目标上达到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和谐发展，充分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生活及其文化。

组织以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的图书，既不是从我们开始，更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相信在“文化大繁荣、文化大发展”的当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到少数民族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行列中来，我们愿意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仁携手共进！

林继富

2012年12月

北京·魏公村

序

吴文科

北京评书是北京曲艺的重要品种,演出北京评书的场所亦即“书场”是北京评书完成艺术创造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通道。也就是说,与任何一种表演艺术样式一样,演出场所的环境要素及其文化意涵包括民俗构成,直接影响并体现着这种艺术的生存状况与发展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考察和研究一种艺术的兴衰沉浮及与社会人群的内在关系,离开对其艺术活动的文化空间包括演出场所与关联人群的关系考量,特别是共存于这种活态场景中的表演者与欣赏者(在北京评书就是说书人与听书人)互动关系的习俗性考察与阐释,就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不很深入的。

正因如此,当我们读到杨旭东博士具有一定学术创新价值和理论探

索意义的专著《当代北京评书书场研究》一书时,应当有理由感到高兴。

这是由于,站在艺术学或者具体如曲艺学的立场去看,本书的研究由于是将“书场”置于问题的中央,从而使得我们对于北京评书的观察包括对其创作、表演和欣赏、传播的探究,有了更为纵深的意识和更加宏阔的视野。换言之,作者笔下的北京评书及其书场研究,不再是简单的艺术活动及其文化空间描述,而是带有因缘索引性质的历史坐标绘制。并且,这种历史坐标的绘制不是简单一般的现象描述,而是通过田野调查展开理论的思索,探讨传统与当下的关系:探寻和思考具有京味特色的北京评书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继承着传统,又如何颠覆着传统,如何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为寻觅保存自己的路径艰难地妥协与抗争。正因立足传统与现代的契合节点,聚焦继承与发展的纠结关系,从而充满了思想的张力,显示出开放的姿态。而这种比较“开放”的研究架构,本身就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学术探索“图景”。

然而,本书的学理价值似乎还不至此。这本书是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所作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北京评书的文化生态”、“评书表演的时空设置与社会变迁”、“书场内外的艺人与书座”、“书场与评书的传承”以及“作为表演的说书艺术”等等方面。这些看似“散漫”的开放式论题,都有一个基本的学科立场作为框范,那就是民俗学的视角;也有一种可贵的学术目的作为追求,那就是方法论的探索。正如作者自己在“绪论”中所言:“意在呈现一个不同于大众传统观念中的评书表演”,“纠正当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中以文本为中心的偏向,力图从生动活泼的现场表演中寻找民俗学理论突破点”。换言之,本书的学术目标,虽然也想揭示评书表演及其欣赏接受的深层社会文化机理,即在“知其然”的同时又追寻“所以然”的习俗化心理动因;但其终极的目的,却是通过田野调查的

延展式探索,在更为深广的意义上,进行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拓展与操作性探讨,即其开展“武器的批判”之目的主要还是想去完善“批判的武器”之功能。从这个意义讲,学理“实验”的意味,在本书中似乎大于学术“探索”的成分。

事实或许就是如此,当我们使用书名标示的题旨去对照本书的具体内容时,也不难发现,本书的主要贡献或者意义,并非完全在于“完成”了题旨设计的某种“答案”;更多的作用与价值,是在揭示当下北京少得可怜的部分传统评书演出场所及其创演与欣赏坚守者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渊源的同时,透过对北京评书生存境遇历史变迁与现实图景的多维度民俗学考察,向读者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值得思考和探寻的发展性问题。

而在我看来,亦即站在曲艺学的学科立场去考量本书在方法论探索方面的学理价值,有一点显得尤为可贵。那就是,在矫正“以文本为中心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偏向”的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对于艺术文化研究中一些关联性事象的“场景复原”及其“价值归位”意义。

比如,本书在“绪论”里谈到自身研究于“学术层面”的价值追寻时,提出应“突破一贯将评书视为民间文学的类别划分”的观点。虽然作者将这种“突破”主要设定在对北京评书的研究应置于更为宏阔的民俗学视野,同时“纠正将评书过分文本化的学术偏见”,“弥补对评书生存现状关注的不足”。但所激活的联想空间和延展出来的启示意义,却远不至此。例如,号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由于学科之间发育程度的不尽相同,向来主要被当作“民间文学”加以研究,后来也有一些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但从更为本真的意义上去看,这些“史诗”事实上都是这些民族各自相应的曲艺品种即藏族的“岭仲”或曰“格萨

尔仲”、蒙古族的“陶力”和柯尔克孜族的“柯尔克孜达斯坦”的说唱表演脚本亦即曲艺演出的曲本。尽管曲艺学界已经将其纳入自身的学科内容进行相应系统的学术研究和知识表达,但由于种种原因,更多的人依然主要将之视为“民间文学”或曰“口头文学”加以认知和对待。诚然,许多文化事象尤其是那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存在,好比昆仑和长城,其景致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出发去进行各自的认知和对待。但不同的认知目的,体现出不同的现实待遇。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作为曲艺的曲本加以对待和保护,亦即将藏族的“岭仲”或曰“格萨尔仲”、蒙古族的“陶力”和柯尔克孜族的“柯尔克孜达斯坦”作为保护对象无疑更为确当。可现实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由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恰恰是将作为这些曲种传统经典曲本的“史诗”作为“民间文学”进行保护了,而没有将这些曲本所以生成和传扬的曲艺品种加以整体性的系统保护。好比保护了“鸡蛋”却忽略了“母鸡”,偏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本真性和活态性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究其原因,除了“民间文学”或曰“口头文学”学科的发育情况较之“曲艺学”良好,从而导致认知与对待的此等“偏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也与“以文本为中心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偏向”的长期存在不无关联。而本书作者对于北京评书的此等研究,恰恰由于走出了民俗学界以往仅仅将其视为“文本”或“民间文学”的研究局限,还原了评书作为表演艺术必须要与鉴赏活动相互关联的民俗事象,着重展示了说书人与听书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拓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丰富了相关的观念与理论。

当然,研究框架的开放性和话题关联的普泛性,使得本书的写作表达,存在着时常将“主语”偏离“书场”本身而被“捆绑”在或者说是“滑

向”了“北京评书”的现象。而北京评书在当下北京的生存与发展,实际上处于极端濒危的状况。具体表现,除了书场存留的几近于无(作者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实际上是一些个不得已的孤例,并且仅仅划定在现有以“物理”性状体现的传统式书场,而没有涉及其它同时以电台、电视台乃至网络传播所构成的现代虚拟性“书场”),最重要的是艺人的大量锐减和演出的极度匮乏,从而陷入生存发展的恶性循环的境况。其间一个十分重要的致命缺陷,就是自身传统的严重流失及其带来的功能锐减和价值弱化。换言之,“说书”的艺术在北京评书等诸多的同类曲种那里,已然退化为简单的“讲故事”。殊不知,故事及其讲述,仅仅是包括北京评书在内的所有“说书”表演的依托与基础,是说书人进行自身审美创造和特有才艺展示的内容依托与思想杠杆;对于故事的讲说,包括艺术形象的塑造、人情事理的评论、名物掌故的解释、环境风情的描绘、审美趣味的营造和思想主题的阐发,以及“古事今说,远事近说,虚事实说,假事真说”的审美表达,才是最终确立自身价值,引起审美共鸣,满足听赏需求的真正“艺术性”之所在!那些远离社会生活、没有思想含量、缺乏人文关怀的所谓评书表演,是难以引人入胜的,也是没有生命力而注定要被社会抛弃的。这就从别一种角度表明,对于北京评书的学术性关怀,因而也不仅仅是民俗学的任务,更非曲艺学本身一己的任务,还是美学与其它学科的共同任务。杨旭东博士站在民俗学立场的此等研究,因而也只能说是其中的一种观察与关怀。好在这种观察与关怀尽管因着研究对象本身的生存尴尬与作者学术操作的娴熟程度而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与不足,但如上所述,此等站在民俗学立场的“本学科”研究,因着研究对象文化身份的自有特点而同时具有曲艺学的作用和“跨学科”的价值,再加上方法论的着意探索,事实上还有着“去学科”的意义。

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中国的国家意志,包括北京评书在内的曲艺形式,也已纳入政府主导的保护范畴。本书对于北京评书的民俗学研究,由于直接触及到传统评书的现代转型和继承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助于人们对于北京评书传承保护的理性思考,具有十分可贵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作者甘于寂寞、贴近实际,深入艺人和书场访谈考察的治学精神与新颖成果,庶几成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推动。

可以相信,随着本书探索的良好开端,更多从民俗学出发的艺术学包括曲艺学研究,必将迎来更加喜人的良好局面。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2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7
第三节 主要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20
第四节 本书整体结构	29
第一章 北京评书的文化生态	32
第一节 北京评书的源流及界定	33
第二节 北京的城市文化品格与曲艺	50
第三节 北京曲艺文化生存现状	66